



仰韶时代与中国文明形成*

朱乃诚

摘要:关于“文明”的标志,按照“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定义,就是“国家”。所以,探索中国文明的形成就是探索中国国家的形成。现在基本可以明确中国国家的最初形成应以距今 5500—5000 年间产生的一批古国为标志,而判断一个社会进入古国发展阶段的主要依据是已经产生“王”的一个不低于五级制的社会组织单位。距今 7000—4700 年的仰韶时代是古国起源与形成时期。其中,距今 5500—5000 年间在长江流域至辽西地区,先后产生了巢湖东部凌家滩古国、辽西地区牛河梁古国、中原核心区双槐树古国、陇右东部大地湾古国、陇东高原南佐古国、太湖流域良渚古国,以及江汉地区石家河古国、海岱地区焦家古国等。中国境内在距今 5500—5000 年间产生众多古国的现象,表明中国古国文明与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并驾齐驱,是目前所知世界上三个不同地区大致同时分别产生的年代最早的三处文明。

关键词:仰韶时代;古国;文明与国家;文明起源;文明形成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6)04-0005-12

DOI:10.16600/j.cnki.41-1426/c.2026.04.009

首先需要说明,本文使用的“仰韶时代”实际上是指“仰韶文化时期”。仰韶时代的年代以仰韶文化的起止年代为依据,大致在距今 7000—4700 年。其中,距今 5500 年以前是中国文明的起源阶段,距今 5500—4700 年是中国文明的形成阶段。本文主要探索中国文明的形成,首先需要明确文明的概念和标志、探索中国文明形成的标志,以及如何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中国文明的形成。

一、文明概念和标志的探索

关于“文明”的概念,这个问题早在大约 100 年前的中国史学界就已经明确了。然而近二十多年来却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认识,因此需要再次明确这一概念。

“文明”一词在我国史学研究中的运用,来源于 20 世纪初期引进翻译英文“civilization”一词,目的是探索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如 1914 年章诤的《中华通史》一书第一篇《文明孕养时代(黄帝前后)》^①,篇名显示其谈论的中国文明时代以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到黄帝时代为标志。又如 1939 年梁思永撰写的《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一文^②,论文题目显示其论证的龙山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处于文明社会的前夜。

从中国考古学角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严格地讲始于 1983 年夏鼐的演讲《中国文明的起源》^③。夏鼐阐明了中国历史学与中国考古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中的“文明”一词是指人类社会的一个发展阶段,并强调这个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有三个:一是氏族制度解体,二是产生了国家

收稿日期:2026-03-2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2024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炎黄文献集成与研究”(24VLS006)。

作者简介:朱乃诚,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101),主要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

组织,三是形成了一个阶级社会^④。其理论依据是摩尔根—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史学说将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发展阶段。这与中国古代从《易经》以来各种传世文献中使用的“文明”一词主要是指“文采光明、文德辉耀”和“有文化的状态”^⑤的含义完全不同。如果以中国传世古代文献中“文明”一词的含义为标准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那么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探索的文明起源与形成,分属不同的探索方向和道路。

至于翻译西文“civilization”一词的“文明”概念,早在1884年恩格斯已经指明:“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1]按照这句话的含义,“文明”的概念是国家,“文明社会”是进入“国家”发展阶段的人类社会。在“文明”这个社会发展阶段中,政治、经济、文化即社会组织、物质成就、精神信仰等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不断繁荣发展的状态和日新月异的面貌。这种新颖的社会发展状态和面貌或可用“组织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等词来描述,且衍生出“稻作文明”“青铜文明”“玉器文明”等术语。

至于“文明”的标志,按照“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定义,就是“国家”。文明社会就是指进入了国家发展阶段的社会。进入文明的标志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国家。所以,探索中国文明的形成就是探索中国国家的最初形成。

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将中国国家的形成以第一个王朝国家——夏的形成作为标志,从而将中国国家形成推定在约距今4000年。然而,经过一百多年的考古学探索,尤其是通过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和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基本可以明确在中国第一个王朝国家——夏之前已经形成了许多控制区域范围较小、发展程度较低的古国。中国国家的最初形成应以这批古国的形成为标志,即中国文明的形成应以产生古国为标志。

二、考古学探索古国形成的主要途径和研究对象

苏秉琦于1985年提出“古国”的概念^⑥。最近笔者又作了进一步阐述:“古国”的概念,简言

之,就是已经产生“王”的一个不低于五级制的社会组织单位。这样的社会组织单位,因为产生了“王”,又是一个社会政治实体,可以称为“古国”。“古国”的基本特征应包含以下五项。第一,古国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区域。这个区域得到一定程度的管理或控制。第二,“古国”的组织结构至少有五个层次,甚至更多。一个没有达到五个层次结构的社会组织不可能产生“古国”。第三,“古国”社会内部必须产生“王”。这个“王”可以是不同级别、不同档次的“王”,但必须是这个“古国”的最高决策者,同时也是最高管理者。第四,“古国”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这个“古国”可以与其他“古国”同时存在、共同发展,但不是依附于其他“古国”或其他级别的社会组织。第五,“古国”内部应存在决策阶层即管理机构。这个管理机构只是一个尚未达到成熟阶段的处于发展状态中的管理机构,甚至是萌芽不久的管理机构。这个管理机构应是“王”同时存在的。如果没有这个管理机构,那么“古国”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存在一个成熟的国家管理机构,那么这个社会组织的发展程度已经超越“古国”的发展阶段。

关于考古学探索古国形成的主要研究对象,按照“古国”的概念,首先需要明确考古学探索“古国”的主要途径及最为核心的内容。笔者曾提出考古学探索“古国”可以通过三个主要途径进行。第一,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有数群聚落址。第二,在数群聚落内的核心聚落址上的文化遗存体现其是一个不低于第五级社会组织单位的代表,以及可以说明不低于第五级社会组织存在的相关遗存。第三,表现“王”或者“王室”的文化遗存。“古国”与“王”是同时存在的,古国的最主要特点是有了王,即一国之内独一无二的最高统治管理者。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是考古学探索中国王朝国家之前古国的主要途径,也是一个古国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⑦。

至于最为核心的内容,是与“王”有关的文化遗存。因为在“古国”概念中,“王”是核心内容。一个社会组织中如果没有“王”,即使具备了其他许许多多条件,那么这个社会组织也不能够明确为“古国”,只能推测可能是一个“古国”。而有了“王”必然有“王室”。“王”的存在必

然产生“王权”及其文化遗存,“王室”的存在也必然产生“王室”文化遗存。“王”“王权”“王室”应是同时形成的,它们与文明同步起源、同步形成。

依据以上的阐述,考古学探索古国形成的主要研究对象,从有效而便捷的角度考虑,主要是探索、阐述与“王”“王权”“王室”相关的文化遗存,如大型建筑基址、大型墓葬、体现“王权”的典型遗存等情况,阐明与社会组织结构有关的聚落址结构和聚落群址之间的结构关系、墓地和墓群及墓葬之间的关系,阐明与古国控制范围有关的在同一种考古学文化类型中的聚落群联合体的分布状况。其中,体现“王”与“王权”及“王室”的文化遗存,是考古学探索古国的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体现“王”与“王权”的文化遗存数量很少,保存得更少,不容易发现。而体现“王室”的文化遗存则相对较为丰富,自然相对容易发现而便于探索。

综上所述,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中国第一个王朝国家之前是否存在古国的核心内容,主要是探索与“王”“王权”“王室”相关的文化遗存及最早出现的状况。

三、在仰韶时代形成古国的主要体现

依据上述明确的古国概念、考古学探索古国形成的主要途径和主要研究对象,结合迄今为止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成果,大致可以明确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西辽河流域在仰韶时代即距今7000—4700年间产生古国的状况。

(一)中原核心区双槐树古国

双槐树古国以河南省巩义市双槐树遗址第四期为代表,相关的重要遗址还有荥阳点军台、郑州大河村和西山等诸聚落址,显示豫中东部区域在仰韶文化晚期社会发展程度达到了古国发展阶段。双槐树古国的地域范围,大致为西起巩义西部山地丘陵,东至郑州东部黄淮平原西侧,北止于黄河,南线尚不明了,可能止于新密、新郑一带,以巩义、荥阳、郑州为主要分布区域。在此区域内,以双槐树遗址第四期呈现的社会组织发展程度最高,达到了第六级社会组织,因此称之为“双槐树古国”。笔者曾论述了双槐树古国的六项基本特征。第一,有一个地

域范围不大但十分稳定的区域。第二,存在着一个第六级社会组织的大型聚落,即双槐树聚落。第三,大型聚落上存在着核心居住区及院落式大型建筑基址。第四,存在着六级制社会组织的最高统治管理者——“王”,即双槐树第四期核心居住区内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上四合院的主人。第五,存在着多级社会组织。第六,存在着三层社会管理机构^⑧。

双槐树古国体现了距今5100—4700年间中原地区社会发展呈现的一个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地域小,人口数量有限,社会组织仅达到第六级社会组织形式,仅存在着三级社会管理阶层,体现存在“王”的四合院式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规模有限,尚未形成宫城。双槐树古国是中原核心区在仰韶文化晚期最初形成的古国,属中原地区古国初级发展阶段的代表。

双槐树古国是中原地区在巩义至郑州一带率先产生的年代最早的古国,是距今5100—4700年中原地区社会发展程度最高的代表,自然是当时一个不会依附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独立的社会政治实体。双槐树古国的形成标志着中原地区社会发展在距今5000年前步入古国发展阶段,进入文明社会。

(二)陇东高原南佐古国

南佐古国以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南佐遗址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为代表,地处关中平原西北部的陇东高原,目前尚不能以发现的南佐及其周边的遗址明确南佐古国的范围。但是,依据自然地理环境推测,南佐古国控制的范围在六盘山以东、关中西北侧,以庆阳市西峰区为中心的庆阳地区局部。南佐古国的地理位置与关中地区接壤,只是地势较高,或可作为与关中地区关系密切的关中西北部高原古国来认识。

南佐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遗址东、西、南三面有三条冲沟,在遗址西南角汇入蒲河。北部未被冲坏的部分有一个东西向的近长方形平台,在其周围及中部沟渠的两侧,还分布着大小不等的9个似为夯土形成的土堆,俗称土疙瘩,故原称为“疙瘩渠遗址”,1996年改名为南佐遗址^⑨。1984—2022年,考古工作者先后进行了9个年度9次勘探、发掘,推定是一处仰韶文化晚期环壕聚落址,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

核心区由9座夯土形土堆及两重环壕围成,年代在距今5100—4700年间。在遗址中央北部发现了一座四合院形式的宫城。

宫城为长方形,方向为南偏东,有夯土围墙,面积近3700平方米,有门道等设施。主体建筑F1位于中央,呈长方形,坐北朝南,建筑面积约720平方米,室内面积约580平方米,由“前厅”和“殿堂”两部分组成。以版筑法夯筑的主墙墙体厚约1.5米、残高约2米,墙外还有散水台、排水沟等。“殿堂”近方形,南墙开有三门,“殿堂”后部有两个直径约1.7米的大型顶梁柱柱洞,“殿堂”前部有一个直径约3.2米的圆盘形地面式大火坛。前厅亦近方形,南侧无墙,为向南敞开形,地面有三排柱洞,每个柱洞直径约0.8米。地面为夯土地基,厚0.5米以上,其上铺砌土坯,再涂抹草拌泥和6层白灰面。“前厅”和“殿堂”所有墙的内外壁、火坛甚至殿外散水台,都涂抹多层草拌泥和石灰。在宫城内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列多间夯土墙侧室,类似东西两排“厢房”,大致对称分布,每间侧室建筑面积为数十平方米,不少侧室内有圆盘形地面式火塘。在宫城区出土了白陶、黑陶、绿松石装饰品等许多来自东方和东南方等外部区域的贵重物品,还出土了不少带盖彩陶平底瓶等器物,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等^⑩。

依据目前南佐遗址发掘成果及其初步分析,我们推定南佐古国的基本特征如下。第一,有一个地域范围不大但十分稳定的区域,即陇东高原以庆阳市西峰区为中心的庆阳局部区域。第二,存在着一个不低于第六级社会组织的大型聚落,即南佐聚落。南佐聚落包括9座土台、两重环壕,面积约600万平方米。遗址中心区有一座面积约3700平方米的四合院形式宫城。这些现象表明,南佐聚落是一个不低于第六级社会组织的大型聚落。第三,大型聚落上存在着核心居住区及宫城大型建筑基址。该宫城建筑可能居住着王和王室成员,属于王与王室文化遗存。第四,存在着不低于第六级社会组织的最高统治管理者——“王”,即南佐宫城建筑的主人。第五,应存在着多层级社会组织。第六,应存在着多级社会管理机构。第七,通过关中地区与东方和东南方的社会保持着文

化、经济与贸易的交流。

南佐古国体现了距今5100—4700年间关中西北侧陇东高原地区社会发展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地域范围小,估计人口数量有限,社会组织达到不低于六级制的社会组织形式,存在王与王室,存在多级社会管理阶层,体现存在王与王室的核心聚落中心的宫城建筑,以及通过关中地区与东方和东南方保持着文化、经济与贸易的交流。南佐古国的社会发展状态与双槐树古国大致相同,是关中平原及关中西北部陇东高原在仰韶文化晚期形成的古国,属古国初级发展阶段的代表。南佐古国的形成标志着关中与陇东地区社会发展在距今5000年前后步入古国发展阶段,进入文明社会。

(三)陇右东部大地湾古国

陇右东部天水地区在距今8000—5000年前一直是社会发展较为进步的区域,且与关中地区同步。而在距今5000年前后,这里的文化与社会发展与陇东高原一样,突然呈现出强于关中区域的发展势头,产生了大地湾古国。大地湾古国以甘肃省秦安大地湾遗址第四期为代表,重要遗存还有天水师赵村、武山傅家门等聚落址,显示陇山西侧在仰韶文化晚期社会发展程度达到了古国发展阶段。

大地湾古国的地域范围较小,大致处于陇山西侧的局部区域。在此区域内,以大地湾遗址第四期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时期呈现的社会组织发展程度最高。依据大地湾遗址第四期文化遗存,我们推定大地湾古国具有如下特征。第一,有一个地域范围不大但十分稳定的区域。依据秦安大地湾遗址、天水师赵村遗址和武山傅家门遗址的位置推算,大地湾古国的范围可能限于天水市的局部区域,陇山为其东部的天然屏障。第二,存在着一个不低于第五级社会组织的大型聚落,即大地湾聚落。大地湾第四期是大地湾遗址分布面积最大的时期,从山坡下分布到山坡顶,面积达50万平方米,是大地湾遗址最为繁荣的时期。其内有两处大型建筑基址,代表了至少两处核心居住区,即遗址V区的F400、F405大房址和X区的F901大房址。F400大房址占地面积约260平方米,F405大房址占地面积约230平方米,F901大房址占地面

积约420平方米。两处核心居住区可能为第四级社会组织所有,而另一座超大型建筑址,则显示大地湾遗址第四期是一个聚落群联合体的核心聚落。依据笔者研究,这种聚落群联合体核心聚落的社会组织通常不低于第五级^⑩。第三,存在着“王”,即F901大房址的主人。大地湾F901房址是一座特大型地面建筑,位于半山腰的平坡上,朝南、背河谷。房址形成主室、左右侧室与后室结构,面积约240平方米。主室前面还有敞篷式建筑遗存,该房址总面积达420平方米^⑪。大地湾F901房址是目前所见仰韶文化建筑工艺水平最高的大型房屋,其整体结构与形态显示其为宫殿形态的大型建筑。这座宫殿形建筑的主人身份无疑是大地湾古国的王。第四,存在着三级社会管理机构。依据对大地湾第四期发现的56座房址的分析,第一级管理者是居住在大地湾F901大房址的王,第二级管理者大概是大地湾F400、F405大房址的居住者,第三级管理者大致是发现的8座(F15、F326、F409、F414、F415、F819、F902、F906)面积在40—100平方米的中型房址的居住者。

大地湾古国体现了距今5100—4700年间陇右东部天水一带社会发展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地域范围小,人口数量有限,社会组织达到不低于五级制社会组织形式,存在王,存在三级社会管理阶层,存在体现王的核心聚落中心和建筑工艺水平极高的宫殿形建筑。大地湾古国是陇右东部天水一带在仰韶文化晚期形成的古国,属古国初级发展阶段的代表。大地湾古国的形成标志着陇右东部天水地区社会发展在距今5000年前后步入古国发展阶段,进入文明社会。

大地湾古国与南佐古国直线距离很近,但是有陇山阻隔,二者之间不可能存在相互的依附关系,而应是分别在两个自然地理区域内同时产生、档次大致相同的两个社会实体。它们分别存在着由宫殿形态建筑所体现的王及一批王室或权贵成员,是两个古国,不宜将它们合二为一。

(四) 辽西地区牛河梁古国

笔者曾对辽西地区牛河梁古国以《论红山古国》为题作了初步的考察^⑫,总结牛河梁古国

的基本特征如下:第一,存在着王;第二,存在着一个较为稳定而广袤的区域;第三,存在着不低于五级制的社会组织;第四,社会分化程度达到六个等级;第五,流行祖先崇拜和熊崇拜。

牛河梁古国是距今5300—4900年在辽西地区崛起并快速发展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文化特征的聚落群联合体。这个聚落群联合体是距今5000年前后在辽西地区产生的级别最高的社会组织,存在着不以军权而以神权为主要特征的王,拥有一个范围很大且稳定的分布区域,是一个不低于五级制的社会组织,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六个以上等级。内部组织结构简单,同层次社会单位规模与档次参差不齐,管理松散,属于古国的初级发展阶段。牛河梁古国是辽西地区率先产生的年代最早的古国,是距今5300—4900年辽西地区社会发展程度最高的代表,自然是当时一个不会依附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独立的社会政治实体。牛河梁古国的形成标志着辽西地区社会发展在距今5300年前后步入古国发展阶段,进入文明社会。

近年来在河北张家口一带发现大量文化层次较高的红山文化晚期后段遗存,有130多座积石冢等遗存,年代在距今5300—4800年^⑬。此现象显示牛河梁古国在后续的发展中或许繁衍出了几个控制范围较小的古国,有待进一步探索。

(五) 巢湖东部凌家滩古国

凌家滩古国是2012年12月初笔者与宋建在安徽含山县召开的“第一届中国凌家滩文化论坛”上同时提出的^⑭。近年来吴卫红等学者从中华文明先锋的角度对凌家滩文化进行了深入探索与阐释^⑮。最近笔者阐述凌家滩文化已经产生王,进入了古国发展阶段^⑯。现依据近40年来凌家滩遗址和凌家滩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将凌家滩古国的基本特征归纳如下:第一,凌家滩古国控制管理的区域不大,大致在安徽巢湖以东至南京东侧一带,约有4000—5000平方千米,核心区域超过1000平方千米;第二,凌家滩古国在1000多平方千米的核心区域内大约由24处聚落组成若干个聚落群;第三,凌家滩古国的核心聚落是凌家滩遗址;第四,存在着一个五级制的社会组织;第五,凌家滩07M23墓葬是王墓,属凌家滩文化中期,年代在距今5500—

5400年间,王墓体现了当时存在着王;第六,产生了一批玉礼器,凌家滩遗址是中国玉礼器起源的首个中心。

凌家滩文化的年代大致在距今5700—5300年,分为早、中、晚三期。王墓属凌家滩文化中期,距今约5500—5400年,据此可以明确凌家滩古国产生于距今5500年,可能延续发展至凌家滩文化晚期。我们推测凌家滩古国年代在距今5500—5300年。

凌家滩古国是安徽巢湖以东地区率先产生的年代最早的古国,是距今5500—5300年巢湖以东地区社会发展程度最高的代表,自然是当时一个不会依附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独立的社会政治实体。凌家滩古国的形成标志着巢湖以东地区社会发展在距今5500年前后步入古国发展阶段,进入文明社会,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进入古国发展阶段、进入文明的区域之一。

(六)太湖流域良渚古国

太湖流域良渚古国,是以浙江余杭良渚古城以及城内、城外的瑶山祭坛墓地、反山祭坛墓地、莫角山大型建筑基址、大型水利系统等为代表的广大区域。若依据反山墓地第一阶段墓葬体现的王墓及其年代和反山墓地第一阶段墓葬之后尚未明确存在王墓的现象,可将良渚古国的年代推定在距今5000—4800年。良渚古国是目前通过考古发掘研究获得资料最为丰富、研究最为深入的一个古国。

依据已有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可将太湖流域良渚古国的基本特征概括如下。

第一,良渚古国控制的范围比较大。虽然目前尚不能确定良渚古国的控制范围是整个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分布区还是仅限于太湖东南部至杭州湾区域,但是,仅太湖东南部至杭州湾一带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区域。

第二,存在着一座面积约290万平方米的城,即良渚古城。良渚古城城墙基础铺垫大石块,上面以黄黏土堆筑,底部宽40—60米,现在保存较好的地段高约4米。良渚古城南面与北面,都是天目山的支脉,南、北与山的距离大致相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向东流过。良渚古城的地理位置显示,营建城之前经过精心勘察与规划。

第三,存在莫角山宫殿区。莫角山大致位于良渚古城的中部,东西长约730米,南北宽约450米,面积30多万平方米,高5米多,形成一个面积很大的高台地,绝大部分地段是由人工铺垫。在莫角山台地上发现了一批与宫殿区活动有关的重要遗迹现象,如在莫角山台地上形成西北、东北、西南三个高台。西北为小莫角山,最高约10米;东北为大莫角山,面积大,最高约6米;西南为乌龟山,高约4米。三个高台呈三足鼎立之势,在这三个高台上营建大型建筑。莫角山宫殿区多组建筑基址的发现,说明良渚古城中的莫角山大型土台确实是当时级别最高的议事活动中心区域,是良渚古城发挥作用的决策、指挥中心。

第四,存在王墓墓区,即反山祭坛墓地。反山祭坛墓地位于莫角山大台地西北约200多米,面积约3000平方米,是人工堆筑形成的高约6米的小山包。在反山西半部发现第一阶段的9座大墓,随葬品十分丰富,且以玉器为主,其中有几座墓是迄今发现的良渚文化墓葬中随葬品最为丰富、规格最高的大墓。如反山M12大墓随葬品包括647件玉器和435件玉粒、5件石钺、2件嵌玉漆器等。其中有施刻完整神人兽面纹饰的“玉琮王”“玉钺王”“玉权杖”等一批象征王权的玉器,可以确认当时存在王和王权。以上发现为说明当时社会发展进入以王和王权为主要特征的古国和文明提供了铁证。

第五,存在级别低于王墓墓区的姜家山贵族墓地。姜家山墓地已发现14座墓葬,大致呈三排分布。出土随葬品425组644件,包括玉器、石器、陶器、骨器等,以玉器为主。姜家山墓地的年代与反山第一阶段墓地相当,规格等级略低于反山墓地,可以明确是低于王墓区的贵族墓地。反山墓地与姜家山墓地都位于莫角山宫殿区的西部。平面关系显示,良渚古城内宫殿区与王陵区及贵族墓地呈东西向分布。

第六,存在为良渚古城储备粮食的粮仓,即池中寺稻谷存储地。该粮仓位于宫殿区以南区域的西侧,也是一处台地。东部有人工堆筑的小堤坝围成的大型蓄水池。在台地上发现3座房基土台,在台地堆筑土下分布有面积达1万平方米的炭化稻谷堆积,初步估算含有炭化稻谷

10余万公斤,换算成稻谷,可能达20余万公斤。池中寺稻谷存储地紧邻莫角山宫殿区,而且规模大,附近又有大型蓄水池,应是由莫角山宫殿区管控的作为良渚古城储备粮食的粮仓所在。

第七,良渚古城外围有大型水利系统,位于古城外围的北部、西北部、西部,由11条堤坝组成,且按照不同地形、地势分别筑成山前长堤、谷口高坝、平原低坝三种,形成略呈三角形的库区,面积约8.5平方千米。库区东端与塘山长堤相接,共同组成一个具有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等多方面综合功能的水利系统。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保护利用范围约100平方千米。其与良渚古城及良渚聚落群的生产与生活关系密切,显然是为良渚古城及良渚聚落群修建的。这是考古揭示的中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大型水利工程。

上述七个方面的实物遗存及其体现的基本特征表明,良渚古国有一个稳定的控制区域,有完整的都城结构,产生了王与王权以及多级管理机构,应存在着一个不低于六级制的社会组织,存在策划、指挥、运作各种工程的中心及组织、实施的机构,这些充分显示其社会管理较为成熟,文化与经济发展相当繁荣。良渚古国已经脱离了初期发展阶段而进入了较为成熟的古国发展阶段。

良渚古国是太湖流域目前发现并确认的年代最早的古国,是距今5000—4800年太湖流域社会发展程度最高的代表,自然是当时一个不会依附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独立的社会政治实体。良渚古国的形成标志着太湖流域社会发展在距今5000年前步入古国成熟发展阶段,已经进入文明社会。据此推测,太湖流域最初的古国应在距今5000年前,太湖流域在距今5000年前进入文明社会。

(七)江汉地区石家河古国的探索

依据现有的考古发现,江汉地区古国最初产生于距今5000—4500年的屈家岭文化时期。而依据屈家岭文化的主要文化成就及其发展程度^⑧,探索江汉地区最初古国的主要依据是已经发现的众多城址。目前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城址有17座,分别为湖北省天门石家河与笑城^⑨、荆

州阴湘城、荆州马家院^⑩、石首走马岭与屯子山^⑪、应城门板湾与陶家湖^⑫、公安鸡鸣城^⑬与青河城^⑭、安陆王古溜^⑮、沙洋城河^⑯、孝感叶家庙^⑰、大悟土城,湖南省澧县城头山与鸡叫城、华容七星墩等。这17座城址大致呈三大区分布,即洪山东南麓低山丘陵向江汉平原过渡地带、荆山南麓低山丘陵向江汉平原过渡地带、江汉平原西南与洞庭湖平原接合地带。目前不能确定这17座城址分别是一个古国的代表,也不能确定成片分布的几座城址是同一个古国,只能推测其中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石家河城址应是一个古国的代表。同时依据17座城址大致呈三大区分布的状况,可以推测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可能存在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古国。

依据石家河城址的勘探、发掘成果^⑱,石家河古国的基本特征可以提炼为以下几点。

第一,产生古国的中心城址是石家河城址。石家河城址平面近不规则长方形,面积约120万平方米,城垣外有护城河。城内遗存目前似可看出有居住区、墓葬区与祭祀区的划分。在城外周边区域分布着数十处聚落,是目前所知屈家岭文化城址附属聚落数量最多的一处。

第二,存在着一个稳定的区域。这个区域可能是石家河城址周边直径约50公里范围内,如以天门笑城城址距石家河城址约25公里计算,也可能是以天门石家河城址为中心的7座城址(天门石家河与笑城,应城门板湾与陶家湖,安陆王古溜,孝感叶家庙、大悟土城)所在的洪山东南麓低山丘陵向江汉平原过渡区域。

第三,存在着不低于五级制的社会组织。目前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城址,从规模上可以区分为大、中、小三种。大型城址如石家河城址,面积约120万平方米;中型城址如公安鸡鸣城城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小型城址如笑城城址面积约9.8万平方米,走马岭城址面积不足8万平方米。这些大、中、小不同规模的城址或许体现了当时社会组织规模及等级。再加上依附在大、中、小型城址周边的聚落,推测其社会组织达到六级,即当时可能存在六级制的社会组织。如普通聚落址通常代表的是一个二级制或三级制的社会组织,因为一个聚落内通常存在着若干家庭和若干家族,小型城址应是代表着

一个三级制或四级制的社会组织,中型城址应是代表着一个四级制或五级制的社会组织,大型城址应是代表着一个五级制或六级制的社会组织。以面积约120万平方米的石家河城址规模最大,分布在城址周围的聚落最多,应是屈家岭文化级别最高的聚落,其代表的社会组织应不会低于一个五级制社会组织。

第四,社会分化明显,产生了贵族。目前在以石家河城址为中心的洪山东南麓低山丘陵向江汉平原过渡区域内7座城址中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墓地,是石家河城址内的邓家湾墓地和城址外的肖家屋脊墓地。

邓家湾墓地发现52座竖穴土坑墓,分为两种:一种是略大的带二层台的土坑墓,有14座;另一种为规模略小的普通土坑墓。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邓家湾M58。该墓坑长约3.2米、宽1.25米、现深0.3米。墓室四周为二层台,为单人二次葬,随葬陶器44件。墓室内脚端置喇叭形薄胎陶杯、鼎、盆、器盖、小罐等小型陶器10件,在脚端二层台上置大陶罐32件和碗、盆各1件^⑨。普通土坑墓如M70,长1.7米、宽0.6米、现深0.35米,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在墓室内脚端随葬6件陶器^⑩。还有无随葬品的小墓。

肖家屋脊墓地发现37座竖穴土坑墓,其中8座墓(M21、M28、M47、M52、M56、M57、M58、M62)规模较大,有的为带二层台的土坑墓。如肖家屋脊M28,墓坑长3米,宽0.8—1米,两侧为二层台,脚端挖一个宽于墓室的浅穴式随葬器物坑,单人二次葬,随葬陶器25件^⑪。肖家屋脊M52,墓坑长2.25米、宽1.24米、残深0.25米,一侧为二层台,二层台的宽度占墓坑宽的一半以上,单人二次葬,随葬陶器20件^⑫。肖家屋脊墓地中8座规模较大的墓葬,规模都没有超越邓家湾M58。

墓葬形制和规模显示,邓家湾52座土坑墓和肖家屋脊37座土坑墓的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可以区分为三等。其中,邓家湾M58为第一等级,是当时的贵族墓。邓家湾其余13座带二层台墓葬和肖家屋脊8座较大墓葬为第二等级。其他墓葬为第三等级。如果考虑到可能存在比邓家湾M58墓葬规模更大、档次更高的墓葬,当时社会成员可能至少存在四个等级,其中第一、

二等级成员是当时的贵族。至于当时是否存在王,目前尚不能确定。

目前在这7座城址中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建筑基址是门板湾F1带廊道的多间组合房址^⑬,为高台建筑,东西长16.5米、南北宽7米,面积115.5平方米。其使用土坯砌墙基和墙体,保存的墙体高达2.2米。为带廊道的四连间一体的房屋,设9门7窗,席子铺底,充分体现了屈家岭文化的建筑水平。门板湾F1是一座院子内的一组独立的房址,整个建筑是以F1为主体的一座院落^⑭,结构新颖,是目前发现的屈家岭文化中最先进的建筑,也是同时期土墙房屋建造水平的最高代表。但是房址规模不大,显然不能作为王或王室成员的居所。另外,上述分析的已经发现属规模最大的墓葬邓家湾M58墓显然不具有王墓、王室成员墓葬的特征。

上述分析表明,在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可能已经产生古国,可能不止一个古国,以石家河古国规模较大。石家河古国可能是江汉地区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国,是距今5000—4500年江汉地区社会发展程度最高的代表。但是,由于没有发现与王、王室相关的遗存,目前尚不能确认其古国性质,有待进一步探索。

(八)海岱地区焦家古国的探索

海岱地区在大汶口文化中期后段至晚期前段距今约5000—4500年间社会发展较快,取得的文化成就较高,亦应产生了多个古国。只是依据目前的发现,只能推测可能存在着以章丘焦家遗址为代表的焦家古国。

焦家遗址发现于1987年,2016、2017年进行了系统的勘探和发掘。遗址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在遗址中部发掘2117平方米,发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城址的夯土墙与环壕、116座房址、1座陶窑、215座墓葬、20多座祭祀坑等一大批重要遗存^⑮。焦家城址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座大汶口文化中期后段的城址,且在城址内发现成片的房址与大型墓地,墓地内发现20多座有棺槨葬具的大型墓葬。

依据焦家遗址的勘探、发掘成果,焦家古国的基本特征可以提炼为以下几点。

第一,焦家城址为古国的核心聚落。焦家城址平面为不规则椭圆形,面积约12.25万平方

米。城垣外有城壕,城内有居住区、墓葬区。大墓有棺槨葬具,随葬品相当丰富。焦家遗址是目前所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鲁中北地区社会发展程度最高的代表。

第二,存在着一个稳定的区域。目前尚不能明确焦家古国控制着多大的区域。焦家城址周边分布着如董东、付家、李官遗址等数处聚落,在焦家遗址以南5公里处有著名的城子崖遗址。焦家城址的文化遗存体现其是一处区域内核心聚落,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鲁中北地区社会发展程度最高,我们推测焦家古国应控制着一个较大的区域。然而,目前已经发现明确的距今5000年前后其他古国的控制范围大都不是很大,我们推测焦家古国的控制范围可能也是一个有限的区域。

第三,社会分化明显,产生了贵族。在已经发掘清理的215座墓葬中,可以区分出大、中、小三类。大型墓有20多座,都有棺槨葬具,随葬品丰富,有玉器和大量精致的陶器。最大的M152墓葬为重槨一棺,玉器等珍贵物品置于棺内,内槨和外槨内分置其他随葬品。其余大墓都是一槨一棺。中型墓数量较多,有113座,都有木棺葬具,在墓主人头端和脚端放置陶器,随身佩戴小件玉石和蚌类装饰品。其余为小型墓,约80座,多无葬具,无随葬品或仅见少量陶器、骨器和蚌器。这大、中、小三类墓葬表明当时社会已经产生明显的分化,至少存在着三个层次,加上最大的M152墓葬,社会成员至少存在着四个等级,产生了贵族。

第四,可能存在着不低于五级制的社会组织。目前对焦家古国的社会组织结构尚未开展研究。焦家城址为核心聚落、周边分布有数处聚落,是鲁中北地区社会发展程度最高的聚落,其墓葬反映的社会成员至少存在四个等级,据此我们推测焦家古国是一个不低于五级制的社会组织。

至于当时是否存在王,目前尚不能确定,因为已经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重槨一棺M152墓葬的规模与随葬品现象,显示M152墓主人不具有王与王室成员的特征。也尚未发现可以确认为属于王或王室的大型建筑基址和象征王权的遗物。目前在焦家城址内发现的116座房址都是

规模较小的半地穴式和基槽地面建筑,没有发现王和王室成员居住的建筑址。

上述分析表明,焦家古国可能是存在的,是距今5000—4500年海岱地区社会发展程度最高的代表,只是与王、王权、王室相关的遗存有待发现和明确。依据已经了解到的焦家古国的上述这些特征,以及已经发现的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大型聚落址和大型墓地及其大型墓葬等现象,我们推测在海岱地区可能还存在着与焦家古国同时期的其他古国。

四、中国文明形成的形式和特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明确中国文明在距今5500—4700年间形成,这个时段大致相当于仰韶时代中期后段和晚期。中国文明形成的标志是在各地出现规模不同的各种古国。根据众多古国的出现状况,概括中国文明形成的形式和特点如下。

(一) 中国文明形成的形式

第一,中国文明在距今5500年诞生,即以目前明确的年代最早的凌家滩古国及其产生年代为证据。第二,距今5500—4700年是中国文明的形成期。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最早产生的一批原生古国大致在距今5500—4700年间。所以,可以将距今5500—4700年作为中国文明的形成期。第三,中国文明的形成,以产生一批古国为标志,是“满天星斗”的形式。中国文明是分别在各个大区内的各个小区域中大致在同一个时期内先后形成,而不是在整个大区域或是整个中国境内整体成片同步发生。即在中原核心区、关中西北部高原、陇右东部、辽西地区、巢湖东部、太湖流域局部、江汉地区局部、海岱地区局部分别于距今5500—4700年开始形成规模不大的古国。推测今后在各个大区内,如中原地区、海岱地区、辽西地区、江汉地区、太湖地区等,还会发现新的区域不大的古国。在中国大地上大致同时产生众多小型古国,中国文明形成呈现“满天星斗”的局面。

(二) 中国文明形成的特点

第一,中国文明早在距今5500年前即已诞生。中国文明形成期则历时较长,依据各主要

区域第一批古国形成状况,距今5500—4700年是中国文明的形成期。而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经历了整个仰韶时代。所以,进一步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还需要对仰韶时代各个小区域的社会发展状况分别做个案研究,以便进一步明确各个小区域内文明起源与形成状况,在此基础上,综合分析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总体状况。

第二,中国文明的形成即古国的形成分别发生在一个个自然环境条件较为优越的区域内,且形成了一个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这种环境条件对文明形成的影响需要做深入的探索。

第三,中国文明的形成即古国的形成是在一个个小区域内或是某一考古学文化的局部区域经历了连续发展、未曾中断的社会发展过程,前后可能经历了较长时间,即由平等的社会,逐步走向分化,社会发生剧变,进入古国发展阶段而步入文明社会。其中,古国的起源与形成过程与社会发生剧变有关,大致发生在仰韶时代的早中期,且可能是该小区域社会发展产生了创新的内涵,从而引发社会产生突破性发展。所以,对仰韶时代早中期各个区域古国之前的社会发展状况需要做深入的探索,以便解析每个古国形成的过程和原因。

第四,中国文明形成即古国形成最主要的特点是产生了王,形成王权与王室。所以,探索体现王、王权、王室起源与形成的文化遗存,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一个关键突破口。

第五,中国文明是在各个小区域内原生产生古国从而共同构成了中国文明,每一个古国的产生只是分别代表着中国文明形成的一个现象。目前在各个大区域内产生的第一批古国,都相距有一定距离,在这些古国之间,可能存在着文化上的交流,但是不存在受到其他古国政体影响而产生新的古国的现象。第一批古国中每一个古国都是原生产生的,每一个古国的产生都代表着中国文明形成的一个现象,是中国文明形成期的一个特点。而那些在各大区域内原生产生的第一批古国现象,则共同构成了中国文明形成的总体状况。所以,欲阐明中国文明形成的总体状况,就需要对第一批产生的众

多原生古国作总体的研究。

结 语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文明”的标志主要是“国家”的诞生,探索文明的形成自然是探索国家的形成。如果现在我们从历史学和考古学角度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是秉承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传统,尤其是继承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史学传统,将“文明”作为一个社会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发展阶段,那么对这个“文明”的概念和定义不应该有怀疑与修正。

中国在进入王位世袭的王朝国家——夏之前已经产生了古国。古国也是国家,只是相对于王朝国家而言,控制范围较小,社会发展程度较为低下,王权较弱,社会规模有限,组织级别不高,管理层级不多且管理松散,制度薄弱或缺乏,文化与经济成就有限。但是,古国毕竟已经产生了王与王权,控制着一个较为稳定的区域且在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大致同步发展,形成了一个不低于五级制的社会组织,存在着多层级的社会管理机构,文化和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甚至达到某种程度的繁荣,社会成员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这种古国的出现应是文明最初形成的标志。

中国在距今5500年出现古国,即凌家滩古国,至仰韶时代结束即距今4700年,已经明确至少存在着六个古国,分别为中原核心区双槐树古国、陇东高原南佐古国、陇右东部大地湾古国、辽西地区牛河梁古国、巢湖东部凌家滩古国、太湖流域良渚古国。此外,还应有江汉地区石家河古国、海岱地区焦家古国等,可能还有许多古国有待发现。这些现象表明,距今5500—4700年是中国古国形成时期,亦即中国文明形成时期。而整个仰韶时代即距今7000—4700年是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时期。

古国虽然规模较小、发展程度较低,但是数量较多。古国分布范围,南达长江以南,北至西辽河流域,西起陇山东侧,东止于大海,相当广泛。在这广袤的区域内产生众多的原生古国,犹似“满天星斗”。古国历时发展了很长时间,从年代最早的凌家滩古国在距今5500年形成算

起,至夏王朝形成之前的陶寺古国为止,前后经历了约1500年的发展过程。在这广袤的区域历时1500年内诞生的众多古国现象表明,距今5500—4000年这1500年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古国时代,即中国古国时代。

目前,中国境内在距今5500—5300年间已经形成具有王特征的中国年代最早的古国,即凌家滩古国,以后可能还会发现距今5500年前后形成的其他古国。至距今5000年前还产生了双槐树古国、南佐古国、大地湾古国、牛河梁古国,可能还有太湖流域的最初古国、海岱地区的最初古国等。中国境内在距今5500—5000年间产生的众多古国,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进入文明发展阶段的特色。这与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人建立的城邦小国(公元前3500—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前王朝时期(公元前3500—公元前3050年)大致同时。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古国文明与苏美尔文明、古埃及文明并驾齐驱,是目前所知世界上三个不同地区大致同时分别产生的年代最早的文明。

中国在距今5500年产生古国标志着中国文明诞生,中国在第一个王朝国家——夏之前存在一个历时1500年的古国时代,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年代最早的三处古文明之一,这是经历四十多年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和二十多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所取得的显著成就。

注释

①章诤:《中华通史》甲编《上古史》第一篇《文明孕养时代(黄帝前后)》,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②该文是梁思永于1939年提交第六届太平洋学术会议的论文,其中文稿后刊发于《考古学报》第7册,中国科学院1954年版,第5—14页。③《中国文明的起源》是由夏鼐于1983年应日本广播协会(NHK)邀请所作的三次学术讲演稿整理而成,原为日文版,1985年由文物出版社首次推出中文版,2009年由中华书局再版。④朱乃诚:《夏鼐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6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9—88页。⑤《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58页。⑥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载《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6—79页。⑦⑬朱乃诚:《论红山古国》,《中原文化研究》2025年第6期。⑧⑪朱乃诚:《黄帝时代与双槐树古国》,《信阳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25年第6期。⑨赵雪野:《西峰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234页。⑩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等:《甘肃庆阳市南佐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23年第7期。⑪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413—428页。⑫龚湛清:《寻找河北红山文化璀璨星河》,《河北日报》2025年7月11日;朱乃诚:《红山古国与黄帝有熊氏》,《中原文物》2025年第6期。⑬汪佳佳:《凌家滩文化是中华文明的先声——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信息中心主任朱乃诚》,《马鞍山日报》2012年12月4日;朱乃诚:《中华文明的先声——凌家滩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4期,2013年1月;宋建:《从凌家滩墓地看古国的社会分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4期,2013年1月;宋建:《中国早期文明进程中的古国——凌家滩和福泉山》,载《“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248页。⑭吴卫红、刘越:《凌家滩:中华文明的先锋》,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77—103页。⑮朱乃诚:《凌家滩玉器与凌家滩王墓》,《文物》2026年待刊稿。⑯朱乃诚:《屈家岭文化的文化成就及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与作用》,《考古学集刊》第20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67—91页。⑰黄文新:《天门市笑城新石器时代及周代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6)》,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306—307页。⑱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马家院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文物》1997年第7期。⑲⑳荆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公安、石首三座古城勘察报告》,《古代文明》第4卷,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412页。㉑李桃园、夏丰:《湖北应城陶家湖古城址调查》,《文物》2001年第4期。㉒贾汉清:《湖北公安鸡鸣城遗址的调查》,《文物》1998年第6期。㉓蒋俊春、李翠萍:《安陆市王古溜新石器时代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322—324页。㉔荆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门市后港城河城址调查报告》,《江汉考古》2008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湖北沙洋县城河新石器时代城址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9期。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市博物馆、孝南区博物馆:《湖北孝感市叶家庙新石器时代城址发掘简报》,《考古》2012年第8期。㉖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地区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294页;石河考古队:《湖北省石河遗址群1987年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湖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湖北省荆州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考古队:《谭家岭》,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方勤、向其芳:《石家河遗址——持续见证长江中游文明进程》,《人民日报》2020年10月31日。②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邓家湾》,第95页、第109—111页,第85页、第87页。④⑤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第63页、第67—68页,图四五、四六,第65—66页,第73—74页,图五一、五二。⑥李桃元:《应城门板湾遗址大型房屋建筑》,《江汉考古》2000年第1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应城门板湾新石器时代遗址》,载

国家文物局主编:《199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7—1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彩版17-1。⑦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应城门板湾新石器时代遗址》,载国家文物局主编:《199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第445页,图5-11.C。⑧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济南市章丘区城子崖遗址博物馆:《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18年第7期;《济南市章丘区焦家遗址2016—2017年聚落调查与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12期;《济南市章丘区焦家遗址2016—2017年大型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12期。

参考文献

- [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83.

Yangshao Era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Zhu Naicheng

Abstract: Following the definition that “the state is the epitome of a civilized society”, the marker of “civilization” is state.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equivalent to exploring the emergence of the Chinese state. It is now generally acknowledged that the initial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 is marked by a cluster of ancient states that emerged between 5,500 and 5,000 years ago. The primary criterion for determining whether a society enters the stage of ancient states lies in the existence of a sovereign-led social organization with no fewer than five hierarchical ranks. The Yangshao Era, dating back to 7,000 to 4,700 years ago, witnessed the origin and formation of ancient states in China. Between 5,500 and 5,000 years ago, a host of ancient states successively emerged across areas from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to western Liaoning. These include the Lingjiatan Ancient State in eastern Chaoahu, the Niheliang Ancient State in western Liaoning, the Shuanghuaishu Ancient State in the Central Plains core area, the Dadiwan Ancient State in eastern Longyou, the Nanzuo Ancient State on the Longdong Plateau, the Liangzhu Ancient State in the Taihu Lake Basin, as well as the Shijiahe Ancient State in the Jiangnan region and the Jiaojia Ancient State in the Haidai area. The emergence of numerous ancient states across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indicates that China’s ancient state civilization stood alongside the Sumerian civilization and Ancient Egyptian civilization. As currently known, these three civilizations are the earliest ones arisen at roughly the same time in thre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Keywords: Yangshao era; ancient state; civilization and the stat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formation of civilization

[责任编辑/启 轩]



中原文化研究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Research

本期学人



朱乃诚 1955年生，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信息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秘书长暨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史前文化研究分会会长、《考古》和《考古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中国考古学史、中国古代玉器研究。参加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课题组，出版有《中国文明起源

研究》《中华龙：起源与形成》《考古学史话》等专著，主编有《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中国考古学大事典》等，在《考古》《文物》《考古学报》《考古学集刊》《考古与文物》等发表文章百余篇，代表性文章有《红山文化兽面玦形玉饰研究》《中国考古学百年历程》《中国考古学百年成就》《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六题》《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年代和机制》《山西黎城后庄人首纹玉戚研究》。主编《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要览》获2004年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奖。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良渚遗址群

—反山墓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布